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

主 编 黄祖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成果

地根经济： 一个研究范式及其对土地 宏观调控的初步应用

.....
Land-regulated Economy: A Paradig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s Land
Macroeconomic Intervention

靳相木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

主 编 黄祖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成果

地根经济： 一个研究范式及其对土地 宏观调控的初步应用

.....
Land-regulated Economy: A Paradig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s Land
Macroeconomic Intervention

靳相木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地根经济的概念,为观察、评价和改进当前中国转型发展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在地根经济这一研究范式之下,作者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土地宏观调控进行定性、定位,对土地宏观调控政策作了梳理、分类和前瞻,并对近年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初步评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根经济:一个研究范式及其对土地宏观调控的初步应用 / 靳相木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308-05577-2

I. 地... II. 靳... III. 土地管理:宏观管理—研究—中国 IV. F3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861 号

地根经济:一个研究范式及其对土地宏观调控的初步应用

靳相木 著

丛书策划 陈丽霞 阮海潮

责任编辑 傅百荣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浙大同力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577-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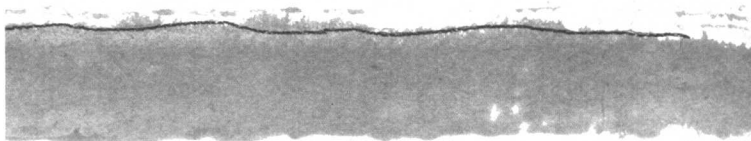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072522

靳相木，男，山东莒南人，1969年1月生，管理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教授、CARD研究员。主要从事土地法学、土地经济、农村发展领域的研究。出版专著《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mail: jinxiangmu@zju.edu.cn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第二辑）

- ◎ 地根经济：一个研究范式及其对土地宏观调控的初步应用
- ◎ 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问题研究
- ◎ 基于循环经济的现代农业研究：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区域实践
- ◎ 冲突与协调：转型期农村组织及其关系研究
- ◎ 灌区水价改革及其影响研究
- ◎ 中国水产业的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傅百荣

封面设计： 春天 书装工作室
tel:13051363823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黄祖辉

副主编: 徐旭初 蒋文华

编 委: 钱文荣 郭红东 杨翠迎

靳相木 王 健 胡 豹 韩玲梅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05JZD00013)
-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CARD) 国家“985”二期工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项目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仍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 109655 亿元增长到 183085 亿元,增长了 6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6860 元增加到 10493 元,增加了 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2366 元增加到 3255 元,增加了 37.6%。此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明显,2005 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15.2% 下降到 12.6%,农村人口的比例从 2001 年的 62.3% 下降到 57%。然而,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起广泛关注,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互相交织、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

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在各种挑战中,“三农”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人地矛盾、粮食产不足需、农民权益亟待加强保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都反映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正日渐具备。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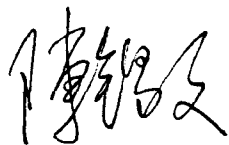
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央针对“三农”问题,从 2004 年开始发了三个一号文件,2004 年的一号文件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题,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核心;2005 年的一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抓住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关键;2006 年的一号文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抓住

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这三个文件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纲领。

在此背景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也加大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院长黄祖辉教授带领 20 多位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和政策进行了联合攻关和深入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的形式公开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涉及了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方面,从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和组织体系,到具体的粮食、收入、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从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到操作层面的政策设计,对近年来“三农”问题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与整合,提出了许多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观点。这套丛书的内容深深植根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丰富实践和探索,为全国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一定有助于把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事关全局,只有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尽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经济上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充分调动 8 亿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才能真正加快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步伐,才能在 2020 年如期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2006 年 12 月 13 日

前 言

中国正处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正向现代化急速迈进的时代,一个正实践着几代人梦想的时代。当人们在新世纪之初满怀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呼唤和渴望之际,总会回忆起过去 100 多年来所走过的探索之路。

160 多年前,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华大地的古老国门,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坚船利炮,面对割地赔款,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对以洋务运动,并兴建北洋水师。甲午一战带来的切肤之痛,方知弱不在船炮,而在制度。无论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正式制度的变革,还是新文化运动对非正式制度的冲击,无不源于对落后挨打、开除“球籍”的恐惧和对国富民强、兴旺发达的渴求。其后,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轨迹,短期内迅速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抗日救亡成了最紧迫的任务,战时的制度安排成了抗战胜利后路径依赖的重要部分。1949 年后,国人迎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国内环境,却又走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之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人们播下的是热情和希望,收获的却是贫穷和浩劫,换来的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最初从农村开始。一个看似小小的举措——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户自己耕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门。此后,中国终于抓住了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发展机遇。基于“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有利条件,持续 20 多年 GDP 年均 9% 以上的增长,年均 1 个百分点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年均 1 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1980—2000 年,在吃、穿、用等消费品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中的轻工业化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以住宅和汽车需求的全面启动为契机,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重工业化阶段。其间,中国又加入了令国人魂牵梦绕的 WTO,彻底结束了与国际社会疏离、隔绝的历史。总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推进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

然而,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在中国试图用几十年的时间跨越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时,“三农”问题就像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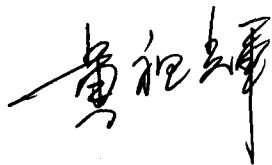
不和谐的音符,时时拨动着中国民众的心弦。从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到朱镕基坦言最牵挂的是“农民收入问题”,从《中国农民调查》披露的桩桩案件,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数据统计,所有这一切都凸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都把“三农”问题放在党和政府工作的首位,放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在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三农”问题的同时,国内理论界也加大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激烈的讨论。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集合。这些问题不仅必然地服从于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也根本地受制于中国作为人地关系紧张、区域差异极大的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还现实地依赖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更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后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凸显紧迫性。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稳定农业增长的问题,而且是如何谋求农业、农村、农民长远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充满矛盾、痛苦和冲突。因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历史进程,是一场影响数亿农民乃至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划时代的经济社会革命。

在此背景下,作为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于2004年5月正式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20多位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组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了近3年时间的联合攻关,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系统的探索,并将研究成果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的形式分批出版发行。

我们不仅期待着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对“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更期待着中国早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期待着经历了百年曲折的中华民族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2006年12月31日于杭州华家池

目 录

1 导 言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转型发展中的宏观调控	3
1.3 本书的内容安排和结构	11
2 地根经济:中国转型发展的一个研究范式	12
2.1 中国经济史上的地权、国家和周期律	12
2.2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方位	22
2.3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	26
2.4 小结: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地根经济	34
3 地根经济的产权基础	38
3.1 中国土地产权的基础构造	38
3.2 中国土地产权体系中的基本制度安排	39
3.3 地根经济特殊阶段的土地产权改革	50
4 地根经济的市场基础	53
4.1 公有土地进入市场的关键问题及其论争	53
4.2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和进展	56
4.3 中国土地市场的基础构造	59
4.4 小结	64
5 地根经济特殊阶段的土地宏观调控	65
5.1 土地宏观调控的性质	65

5.2	土地宏观调控的地位和目标、重点领域以及政策框架体系	66
6	基于数量的土地宏观调控	69
6.1	基于数量的土地宏观调控的原理	69
6.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73
6.3	土地征收征用政策	78
6.4	土地供应政策	94
第6章附录1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	98
第6章附录2	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	103
7	基于价格的土地宏观调控	107
7.1	基于价格的土地宏观调控的原理	107
7.2	土地出让金政策	110
7.3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	112
7.4	土地税收政策	114
第7章附录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 (2006年本)	117
8	基于可转让配额的土地宏观调控	134
8.1	新增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区际配置模式的选择问题	134
8.2	相关文献回顾	135
8.3	对美国土地发展权的解析	138
8.4	基于可转让配额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设计:美国土地发展权 的中国表达式	147
9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	153
9.1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机制和政策包	153
9.2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政策效果初步分析	156
9.3	简要的结论	166
10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结构调控	168
10.1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结构调控的机制和政策包	168
10.2	土地政策参与产业和部门结构调控	171
10.3	土地政策参与区域协调发展调控	178

11 土地政策参与城乡统筹发展调控	186
11.1 土地政策参与城乡统筹发展调控的机制和政策包	186
11.2 土地政策参与城乡统筹发展调控评价:以滕州个案为例 ...	190
11.3 改进土地政策参与城乡统筹发展调控的行动和制度安排:基于 滕州个案的讨论	220
12 结论与讨论	228
12.1 主要研究结果	228
12.2 进一步的讨论	231
12.3 本书的可能贡献和遗憾	233
附 录	234
附录一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234
附录二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241
参考文献	245
跋	249

1 导言

1.1 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一面旗帜,我国的土地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我国的土地制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系统。说它独特和复杂,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全面实行土地公有制,包括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公有制在法律上的表达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立法例,迄今为止在中国同样也没有达成社会共识。也就是说,土地公有制在法律上还是一个很难清晰表达的范畴,尤其是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更是难以从人类社会已有的法制资源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法律概念。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地权形式中,私有地权已经成功地被法律清晰勾画出来。很显然,不能被法律表达的制度,就无法给当事人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激励。当代中国正在走入法治社会,把政治经济学或政策意义上的土地公有制在法律上表达出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工作之一。但这项工作,我们才刚刚开始。

二是当代中国仍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中,制度变迁是社会变革的显著特征,而土地制度变革又首当其冲。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为止,中国土地制度的调整、改革和演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和调整还将继续下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样一个正在变迁中的规则系统,必然是一个复杂而难以把握的东西。

在世界一体化潮流中,这样一套独特的土地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产生了深刻的、辩证的影响,形成了当代中国的独特的国家、产权和市场(社会)关系。从微观经济层面观察,由于土地公有制以及与之

配套和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存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单在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而且本身还以“企业”的身份在行动。当前,中国地方政府还是一个经济活动主体,是农用地非农化开发的第一行动团体,是第一序位的“土地开发商”。因此,只要土地公有制存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必定有别于典型意义的市场经济,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机制和作用也必定具有中国特色。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必然由于土地公有制而有别于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提出并实践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这样一种探索正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

既然土地公有制这样一套规则系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此深入和广泛,那么,不管土地制度这套规则系统怎么复杂,我们都要尽可能地把握它、认识它,在此基础上驾驭、改造和完善它。这里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搞土地私有化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公有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呢?对此,当然会有多种答案。

土地公有制是一个利弊共生的制度安排,它的弊端这里不赘述。其实,土地公有制提供的产权关系的“模糊空间”,恰恰应该是土地公有制的特色和生命力之所在。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一“模糊空间”提供了政府在经济超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促进后发性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博弈平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如大规模的征地、工业园区的开发、超常规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近年来房地产业的崛起和辉煌,等等,无疑都与土地公有制提供的“模糊空间”有很大的关联。

应该承认,土地制度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杠杆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赶超世界先进并和平崛起过程中,政府势必要发挥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的优势,而政府得以发挥这一优势的基石就是土地公有制。未来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就连对地权的物权法保护,都不能轻易丢掉这一基石。在这一逻辑之下,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度,从而中国的地权,恐怕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原则的前提下,沿着一个兴利除弊的独特的路径持续而缓慢地发展着、演变着。

基于上述视角,本书拟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着眼于土地公有制及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安排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入、广泛影响,提出和论证地根经济这一研究范式,探索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特殊阶段的规律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研究范式初步应用与土地宏观调控分析,试图对土地宏观调控的性质、原理、机制、政策体系,以及土地宏观调控

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全局中的地位、发展趋势等,进行总体的、框架性、概念化的梳理、把握和评价。

1.2 转型发展中的宏观调控

1.2.1 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强行军。与当代发达国家在经济史上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中国这一轮强行军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转型发展道路,即:一方面要渐进地实现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促进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和信息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法制、文化等的全面进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特征是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互为条件地交织在一起,要在推进体制变革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发展中推进和深化改革,实现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经过 29 年市场取向改革,中国已经成功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创建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到目前,虽然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大都还未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国地位,但已经有 50 多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而且这一数字在不断增长中。不过,也应该看到,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是不平衡的。从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长看,在产品市场领域,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已基本上不再由政府直接规定,而是由各类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主决策。然而,在要素市场领域,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却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在要素市场上,政府仍然集规则制定者、执行者、市场参与者和仲裁者于一身,还充当着要素资源的重要配置主体。从中国各地区市场发育和成长的进程看,根据樊纲、王小鲁(2004)等人的研究,2002 年市场化总体评分全国平均水平为 5.98 分,东部地区为 7.72 分,中部地区为 5.38 分,西部为 4.68 分,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进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部、西部地区。

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转型期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受到更为深刻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制约。资本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是国有资本的转型及市场化难题,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遭遇的则是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制约,而土地市场化改革碰到的是公有土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市

场化交易难题。由此看来,中国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具有制度变迁上的必然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过程只能是梯度推进的,也因此,中国各地区市场发育和成长的不平衡性就具有发展上的必然性。

从现代化进程看,经过 29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2005 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明显提高。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005 年世界银行按汇率法对世界各国人均收入进行分类,其中偏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国民人均收入为 1746 美元,而我国 2005 年已经达到 1740 美元(刘伟,2007)。

从发展阶段看,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从以衣、食为主升级为以住、行为主;二是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43%,乡村社会正急剧地向城市社会变迁。对于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这两个结构性变化,必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带来深刻变化和复杂矛盾。

1.2.2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超常规特殊复杂性

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 13 亿人口大国,急剧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过程必然有其独特复杂性。准确勾勒中国转型发展的核心特征及其引致的特殊矛盾,全面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超越常规的特殊复杂性,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超常规特殊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中国现行经济形态的特殊规定性上。中国的现行经济形态已经不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府主导与资本自治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还是空白,它与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明显不同,它是在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体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这样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它究竟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历史形式,假以时日它终将按照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发展逻辑前进,还是一种相对独立、持久的形式,并最终将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演化路径,恐怕在短期内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